

毛泽东研究

《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思想 及其历史贡献

贺全胜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战略策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取得了伟大成就,建树了卓著的历史贡献,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实践参照。

关键词: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经济改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4-0032-09
DOI:10.16479/j.cnki.cn43-1160/d.2020.04.004

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简称“书面报告”),共同构成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主体内容,成为我们党领导和指引新中国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及总动员令。《不要四面出击》是对“书面报告”关涉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的全面解释及深刻阐发,创新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战略策略方针。这些重大战略策略方针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0-03-20

基金项目:201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毛泽东与新中国国民经济研究”(项目编号:19YBA336)

作者简介:贺全胜,男,湖南绥宁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要务

1950年6月6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和根本要务，补益和拓展了他“书面报告”关涉国民经济思想，共同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先行探索，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毛泽东从来就重视国民经济发展。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明确提出全党“要向着”新中国“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428}重要思想，彰显恢复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辉思想。新中国伊始，毛泽东就警示全党，“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已摆在我们面前。”^[2]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就提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尤其省以上各级党委“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3]59}。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不仅成为全党的中心议题，而且在新中国社会形成研讨经济建设、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氛围。因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议题提出来，是顺应党心民心之策。

1950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新年，也是恢复国民经济开局之年。国民经济能不能恢复，如何恢复和发展，我们党面临严峻考验。拿出恢复国民经济的显著成绩，不仅展示我们党既能革命斗争亦能建设国家社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能力，而且以雄辩有力事实抨击和挫败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企图以经济困死新中国的罪恶阴谋。新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向好发展，历史见证了新中国人民“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1439}的喜人形势。开局年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这样的时政形势，决定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和根本要务，是切合党威国情民意的大事。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就是在这样的国情民意背景下诞生的，强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他指出：“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3]73}这个论断的实际要义，一是在约占新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广大土地上进行土地改革，使恢复国民经济获得新中国总人口80%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推翻旧中国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就具有了坚实经济基础和深厚群众基础；二是新中国初期土地改革好坏优劣，反映和体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土改工作越是全面铺开，越是深刻彻底，恢复国民经济就越具有更多有利条件，就越利于营造经济建设健康运行的社会气候；三是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本目的是推翻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把持土地资源的反动所有制，实现土地公有、“耕者有其田”的民本经济思想。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才能实现，才会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农民阶级终年辛劳而生活苦难的悲惨命运，彻底颠覆旧中国经济制度以及整个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政权，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

毛泽东还卓远地提出,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绝非轻轻松松、简单容易之事,仍有许多困难条件、因素,试图一蹴而就很不现实,对此全党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困难情况,也就构成我们党领导和指导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工作考量“不要四面出击”的基本动因,必须讲究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新中国经济建设坚实基础。毛泽东认为,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3173-74]这就揭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难性群众性,全党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决“不要四面出击”,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克服,争取伟大胜利。

二、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国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概说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及根本要务,着重从战略策略方针上深刻阐论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极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指导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一) 着重阐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战略策略方针,探索经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基础

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总是从长远全局战略视域思考问题,探索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方策。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确立战略目标,制定方针策略原则,更是他萦绕心回的至高大事。他指出:建设新中国,“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扫清路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造转化消极因素,“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3174]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行战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事业,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泰民安的美好境界。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初衷就在此,“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176]这三个“就是这样”,概说起来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四面出击”,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共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事业,以发展强大的经济实力迎击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新生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设条件,探索经验,奠定基础。

(二) 实行社会经济改组的发展战略,合理调整工商业,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精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基本原理。在新中国社会时代条件下,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执政地位意味着什么,如何提高国计民生水平,严峻挑战在何处,这些问题,毛泽东当然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思想认知自觉。因此,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就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摆到重大战略策略方针上面来。他认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策略方针,就要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推进国

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深刻阐述了社会经济改组和调整工商业的要义和原则性内容。关于社会经济改组，毛泽东指出：“这种改组是必要的”，是“革命胜利”后的必然要求。虽然这种改组，“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造成民族资本家、失业工人、旧知识分子和一切小手工业者“不满意我们”，尚未土改的农民要上交公粮“也有意见”。正是这些“不满意”因素，促使我们党改进工作方法，深入推进土地改革，全面调整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改善民生，变“不满意”者为拥护者支持者。关于调整工商业，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基本方针、实施步骤和基本内容，一是工厂恢复开工，解决开工不足、工人失业问题。工厂开工、工人上工，扭转经济萧条局势，稳定社会秩序，对工人、社会、国家，都大有裨益；二是开仓赈粮救济失业人员。失业工人家庭生活无着落，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缓解失业工人生活困境。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着实温暖、感奋了失业工人，他们自然地“拥护我们”，并转化为建设新中国的实际努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献策出力，焕发精神；三是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广大农村改写了历史，农民阶级改变了苦难命运，成为土地的主人，“分田分地真忙”；四是发展手工业经济，“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手工业经济是重要的经济类型，投资少，生产规模小，点多面广，经营机制灵活高效，生产加工产品丰富多样，能够满足社会人们生活多样化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帮助手工业者，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五是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是新中国社会的构成元素，是建设新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社会成分，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客观必要性。合理调整工商业，调节税收，改进生产设施和劳动条件，有利于改善同工商业者、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调动他们助推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六是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指出：关于旧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是必要的、有益的，使他们在思想上认同党和人民政府，在感情上接受党和人民政府，在行动上拥护支持党和人民政府，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知识分子掌握新知识、科学技术、先进工艺，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经济效益的重要群体。对于多才多艺、资深年老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3]74-75}营造善待知识分子的影响扩散效应，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这些战略策略方针，构成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国民经济思想的根本内容，深化和进一步完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心议题，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行稳致远，奠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实经济基础。

（三）推重团结“可能团结的人”的策略方针，弘扬伟大团结精神，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着重阐述了大团结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一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可能团结的人”。毛泽东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致力践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建设新中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工作，实质上就是要做好团结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是攸关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现实问题。“这个道理”要在全党“讲明”说透彻。同时，以团结促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争取“这些人”站“到我们这边来”，极“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改进国计民生。这是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这个方针。二是推重团结少数民族的方针策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是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我们党关于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方针政策的实体力量。我们党和毛泽东一贯重视和关怀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他们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团结他们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有3000万人，占国民总人口的8%左右，民族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大物博，资源富集，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军。因此，毛泽东提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的具体措施，就是“必须谨慎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不能急躁鲁莽，时机和“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否则会引发少数民族反感和敌对势力乘机破坏，把事情办糟搞杂了。他强调，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要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这种改革，实际上“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来推动^{[3]75}。我们党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得到了全国少数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四）实施“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的策略原则，营造“缓和”稳健的社会氛围，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的精要，就是根据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推进新中国建设，必须实施“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有所“缓和”、有所“进攻”的基本策略原则。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实施这一策略原则，有四大要因，一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积累和创制的“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经验，对于新中国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斗争面扩大了，四面出击，损害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性；二是新中国伊始，我们党对国家建设、恢复国民经济的知识尚付阙如，经验不足，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本领”和能力，帮助我们建设新中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三是减少“斗争”对象，分化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以便“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反对和准确打击真正的反动派和敌对势力，推进新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四是治国理政，张弛有道，循序渐进，讲究策略，“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稳健有序发展奠定基础。这就是新中国建设、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3175-76]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义。总之，“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精诚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分化瓦解中间派和敌对势力，打击真正的顽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共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伟大事业，建设伟大的新中国，以生产发展、丰实的物质财富精神产品，改善民生，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探索积累经验，提供有益借鉴。

（五）从战略策略上补益和完善发展“书面报告”的国民经济思想，奠定《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是对他《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补益和完善发展。这一点，《不要四面出击》的题注，已是解读得很清楚了。这样写道：“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3176]这个题注，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定义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性质，是讲话形式的重要报告；二是明确指出《不要四面出击》是对“书面报告”的说明、补益和完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解释性”意义；三是进一步解释阐发了“书面报告”尚未明示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策略思想”。可以说，《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是对“书面报告”关于恢复国民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的具体深化发展。从《不要四面出击》整个文献内容和表达方式来看，也明确地彰显《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对“书面报告”补益、完善发展的基本特征；从《不要四面出击》的行文动机来看，它起着对“书面报告”恢复国民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的说明、补益、深化发展的作用。总括起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昭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建设伟大领导人付出了艰苦探索努力和尽快改变战乱凋落经济面貌的迫切心情、时代担当精神。毛泽东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指导纲领和伟大决策书，毋庸置疑地奠定了这两部经典著作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

三、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艰辛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成就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基础性事业，建树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卓著历史贡献，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鉴戒意义。

（一）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领导和指导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思想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和指导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伟大工作，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史称“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为推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开辟了道路，指明了奋进方向，提供了战略策略方针指引和根本遵循。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3]312}，是有成就有贡献的。一是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三年年均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超过旧中国最高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二是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结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国民收入增加，民生大为改善。1952年同比1949年，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人增加到1600多万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公教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由140元增加到189.5元，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三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发展。1952年同比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含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4.7%提高为56%；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由30%提高为41.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比重由26.4%提高为35.5%，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瞩目的历史性跃进。

（二）为创制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奠定了理论政策基础

国民经济恢复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和创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389}这就阐明了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与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历史逻辑和政策设计要因。1953年12月，毛泽东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科学内涵，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并深刻揭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3]316}他这两个论断综合起来，一是阐明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二是划定了过渡时期的时限，是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七个年头，六年整；三是揭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新中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四是考究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在逻辑关系，没有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作及其伟大贡献，就没有社会主义过渡

时期的历史阶段和取得“一化三改”的辉煌成就。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奠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坚实的思想理论底蕴和经济政策基础。

（三）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准备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据

从新中国建设的实践逻辑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实施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国家建设任务内容、发展政策设计、实施时机等交织在一起。1951年12月，毛泽东指出：恢复国民经济“准备工作”一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3]207}这个论断，阐明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逻辑。1953年10月，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就阐明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实施的历史逻辑关联，指出：“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3]312}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就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创造较好条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努力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建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稳步提高；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改善民生，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基本结束，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私有制已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有制在新中国国民经济中占领主导地位。1956年同比1952年，国营经济由19.1%提升32.2%，合作社经济由1.5%提升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提升为7.3%，个体经济由71.8%降为7.1%，公有制经济总计达92.9%，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了。

（四）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实践参照

毛泽东总结提出新中国伊始我国生产力落后，工业不发达，国民经济体系不齐全、经济结构不完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样的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总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329}他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3年8月下旬，毛泽东审定《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提出“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最前列。”^[4]这个论断，实质上阐明了“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与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关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75年1月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完整地阐论我国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内容，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到1979年，经过30年艰辛探索，“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我国建立了冶金、机械制造、汽车、石油、煤炭、通讯、化学、电子、国防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铁路、交通运输、农田基本建设较快发展；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成功试验“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我国建构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人民实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独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先行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奠定了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鉴戒意义。1979年3月，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及其辉煌成就，指出：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7]历史的评价，如真如实如铁，科学深邃高昂。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闪烁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思想光辉，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建树卓著功勋，永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典籍里，气贯长虹，彪炳史册。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5.
- [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52.
- [5]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439.
- [6] 叶剑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79-09-30(01).
-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7.

责任编辑：谭桔华